

# 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理论逻辑与物质基础

胡怀国

[摘要]尽管与共同富裕有关的思想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但在开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马克思在批判性考察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方现代化路径及其理论回应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开辟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同时也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一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内在互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

[关键词]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物质基础

[中图分类号] F04;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4-0078-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①</sup>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和未来30年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sup>②</sup>它不仅是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拥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和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本文透过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并借助于思想史的梳理，在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共同富裕有关思想的演进脉络，并特别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推动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内涵。

## 一、共同富裕的早期思想及其历史局限性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又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一个过程，同时还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

作者简介 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36）。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02页。

②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则的一种理论认识。不过，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创新，但与共同富裕有关的思想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例如，早在雅斯贝尔斯（1949）所说的为人类文明提供了“问题和尺度”的“轴心时代”，<sup>①</sup>就涌现出了诸多与共同富裕有关的思想。从先秦时代的孔子到晚清时期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从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的“理想国”到16世纪莫尔的“乌托邦”，东西方文明从不缺乏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设想，其间蕴含着大量与共同富裕有关的思想。

然而，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寻找”。<sup>②</sup>不论是东方文明中的“大同社会”，还是西方文明中的“理想国”和“乌托邦”，其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更多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和主观想象。在农业活动占支配地位的发展阶段，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活动本身的局限性和农业生产的相对脆弱性，使得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农业活动不仅高度依赖数量相对有限、位置相对固定的土地要素，而且容易受到不完全可控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的冲击，同时也难以像工业部门那样采用完全的分工和标准化生产。<sup>③</sup>故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农耕时代，尽管不同地区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各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它们不仅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生产条件相对脆弱，而且生产要素流动性低、社会结构相对固化。这样更容易造成贫富差距的积累，同时还容易因各类内外部冲击或“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而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循环（如秦汉至明清的治乱循环）或陷入较为严重的困局（如古罗马的崩溃、诸多古老文明的消亡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多地是为了维持生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可能普遍地过上一种富裕的生活，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传统农业社会并不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整体性不发展。对此，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曾描述说，“1800年以前，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社会中，人均收入会有所波动，时好时坏，但却没有发生趋势性变化。从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的出现，到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贝多芬直至简·奥斯汀，人类在漫长历史时期都生活在深陷马尔萨斯陷阱的社会中。简·奥斯汀曾描述过手捧中国茶具的优雅品茶闲聊情景，但即使到1813年，大部分人的物质条件并不比他们非洲大草原上的祖先好”。<sup>④</sup>理论经济学家凯恩斯同样认为，“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瘟疫、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其间还有若干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不存在渐进或激进的变化。一直到公元1700年为止的4000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50%，但不会超过100%。”<sup>⑤</sup>正是由于农业活动的局限性、脆弱性以

---

<sup>①</sup> 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是人类社会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发生的最为深刻的转折，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产生的一种精神过程，“轴心时代的观点为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早先的高度文化失去了其形态，承载这些文化的民族在加入轴心时代的运动之后，便消失了。史前的诸民族，在加入轴心时代开始的运动之前，或者一直保持史前状态，或遭灭绝。轴心时代同化了所有留存下来的东西。从轴心时代起，世界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持续的，或者说持续到今天的统一性。”参见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sup>②</sup>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sup>③</sup> 斯密曾指出，“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页。

<sup>④</sup> 克拉克：《工业革命》，阿吉翁、杜尔劳夫主编：《增长经济学》第2A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19-220页。

<sup>⑤</sup> 凯恩斯：《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3页。

及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净剩余相对较少，在以农业活动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中，通常约需要七八成的人口从事同农业有关的活动才足以维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不同文明的各类典籍史料表明，至少在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任何社会似乎只能维持15%—25%左右的人口游离在农业活动之外，几乎没有可以在较长时期将该比例维持在30%以上而不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sup>①</sup>正因如此，斯密在论及柏拉图的“理想国”时指出，“要有一片像巴比伦平原那样极大极丰沃的土地，才可以养活五千懒惰人（当时认为卫护那理想国所必要的战士）及其妻仆。”<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富裕也是仅限于少数群体的富裕，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提供的物质基础，不足以支撑近八成农业人口的普遍富裕。因此，不论与共同富裕有关的早期思想多么美妙、理论设想多么精巧，在通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而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 二、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回应：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经由某种现代化进程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成为实现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概略言之，现代化进程通常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资源配置的持续优化以及现代经济部门的不断成长，它必然意味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迁，迥然不同的政治法律秩序和社会经济关系也随之而生。具体而言，正如马克思观察到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一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sup>③</sup>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围绕数量相对有限、位置相对固定的土地资源，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法律秩序并表现出某种等级化特征和人身依附性。这就使得传统农业社会具有相对封闭性，人们的生产活动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和生存需要，进而每个人往往难以完全凭借自身努力改变自身境遇。与之不同，现代社会是一种高度开放的社会形态，每个人在相对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普遍地参与一种高频次的市场交易和社会交往，人们可以更多地凭借个体努力来改善自身境遇。这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并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来促进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从国际经验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更多地是一个充满风险挑战和巨大不确定性的长期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以及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欧主要国家率先“在边际上”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推动了商品和要素在更大区域甚至全球范围的流动。在这一过程中，西欧主要国家步入了商业革命时代，重商主义则是对这一时代主题的理论回应。按照重商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的说法，重商主义旨在“设法指出一个国王可以公正地分得一部分财富，而不损害或伤及他的属民的种种方法和手段”。<sup>④</sup>其本质上是在农业活动仍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通过国王与商人、权力

<sup>①</sup> 尽管中国史料非常丰富，但关于人口的结构数据仍然比较匮乏。按照《通典》的记载，“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收其图籍，户五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参见〔唐〕杜佑：《通典》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2012年重印本，第145页），即在公元280年吴国的230万总人口中，官吏和士兵各占1%和10%左右，再加上通常5%—8%左右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游离在农业生产活动之外的人口仍然只有不足两成，而这还是在战火纷飞的三国两晋时代。当然，在主要经济体中，英国可能是一个例外：其农业人口比例在工业革命来临的很久以前就有了显著下降并维持了较长时间，这可能是英国率先启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农业革命的重要性。

<sup>②</sup>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54页。

<sup>③</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567页。

<sup>④</sup>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1页。



与资本的结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缝隙中开辟出一种财富积累的新途径。不过，正如古典经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指出的，“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往往被忽视、被压抑”。<sup>①</sup>重商主义固然有助于财富积累和国家竞争，但作为一种以邻为壑并充满短视与偏见的学说，<sup>②</sup>它所推动的仅仅是少数社会成员的财富积累。事实上，重商主义盛行西欧近300年，期间多数经济体的人均GDP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如图1所示），其根本原因在于：仅限于少数社会成员深度参与的商业革命以及本质上“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sup>③</sup>的重商主义缺乏某种普遍性，不足以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普遍富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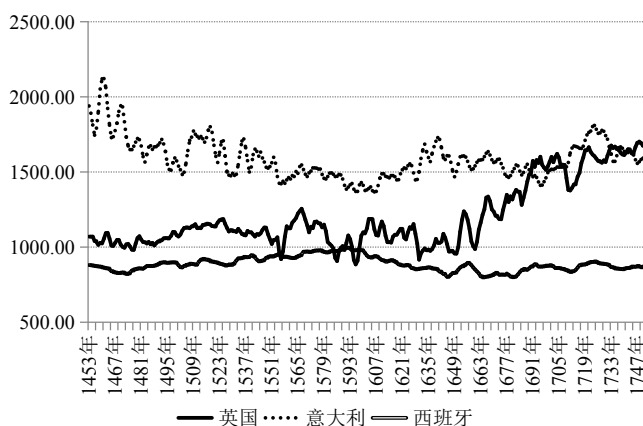


图1 重商主义时期的人均GDP：1453—1753年

数据来源：Fouquet Roger and Stephen Broadberry, “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9, no.4, 2015.

正如斯密（1776）强调的，“世界上从未存在过而且也决不能存在完全没有制造业的大国”，<sup>④</sup>至少就大国而言，只有以人们得以普遍参与的工业化启动的现代化，才有可能为共同富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图1英国人均GDP的“翘尾”，更多地反映了英国制造业等现代部门的渐进兴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中叶率先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事件，它不仅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而且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创造了一种新可能。事实上，正是借助于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在西方主要经济体的扩展，西方国家渐次开启现代化进程并积累起了庞大的物质财富，或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⑤</sup>一般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和诸多因素逐渐积累的结果，同时也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思想基础，古典经济学则是该过程的理论回应（马克思更是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正如前文提及的，现代社会是一种高度开放扩张的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次空前提高并对政治法律秩序和经济社会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被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深刻地认识到，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必须构建一种奖赏个体勤劳的现代社会秩序：“为了促进普遍的勤劳和忍耐，也为了让人们同意从事劳动或者让人们能够胜任劳动，建立某种制度是必要的”，<sup>⑥</sup>其核心是鼓励个体勤奋并保证每个人的收益与努力程度成比例。哈奇森的学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则试图构建一种涵盖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社会包容和经济自由的更为宏大的理论框架，作为古典经济学奠基之作的《国富论》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理论成果。按照斯密的看法，“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

①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2页。

② 恩格斯曾形象地描述到：“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③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29页。

④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6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⑥ 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8-299页。

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sup>①</sup>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sup>②</sup> 而“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sup>③</sup> 以此为基础，斯密围绕人们得以普遍参与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构建了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论经济学体系，不仅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说明并开辟了理论经济学的古典时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整个理论经济学及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问题与尺度”。

尽管英国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物质财富积累并在理论层面上有助于“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但在现实层面，英国工业革命不仅没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在相对漫长的渐进演进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极为残酷的一面。例如，1843年议会调查报告表明，七八岁开始参加工作、每天连续工作14甚至18个小时，几乎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普通民众的常态。<sup>④</sup> 而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下每天连续、紧张地工作18个小时，他往往活不了多久。恩格斯（1845）的观察印证了这一点：“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sup>⑤</sup> 也就是说，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尽管每个人的机会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但作为综合性指标的平均寿命却表明，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恶化了，其整体生活质量甚至还不如“他们非洲大草原上的祖先好”。英国工业革命充分表明，经由工业化开启的现代化，有助于为共同富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但它本身并不能自动引致共同富裕。事实上，即便人们的政治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有关经济活动是自愿的，但这种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的现代社会秩序，不仅不足以弥补不同要素、不同个体在现实世界中必定存在的事实上的差异，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这种差异，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之际，对英国工业革命有着更为充分的观察并进一步认识到，“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sup>⑥</sup> 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同要素的不同特征及其内在差异，特别是劳动要素相对于资本要素的相对弱势及其造成的劳动异化、外化和对象化过程，导致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存在内在冲突。正是借助于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现代化路径<sup>⑦</sup> 及其理论回应（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提出了通过积极“扬弃”劳动异化、实现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政策主张：“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一种“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过程，是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实运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而经济发展则是“人的发展”最根

①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72页。

②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页。

③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1页。

④ 1843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儿童早在三四岁时就开始工作，在五岁或五六岁之间的也不少见；一般说来，正常的雇用七八岁时就开始了，大多数儿童在九岁以前就开始劳动”（第159页）；“几乎每个童工的劳动时间与成年工人一样长，有时连续不停地干活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第161页）；“青年女工一整天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从未超过六小时，常常不到四小时，有时只有三小时，甚至不到两小时”（第161页）。参见派克：《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

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3页。

⑦ 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本的手段：“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sup>①</sup>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②</sup>同时，共产主义必定也是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sup>③</sup>尽管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设想包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并为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其所涉及的共同富裕概念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仍然存在很大不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设想，共产主义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且由于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定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与之适应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某种程度上是对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超越。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至少就相对水平而言，按照黄群慧等（2021）的估算，<sup>④</sup>即便到2050年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时，我国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的40%左右，其生产力水平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正如马克思强调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⑤</sup>事实上，尽管马克思及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共同富裕本身却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成果。

###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内嵌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但正如马克思强调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sup>⑥</sup>我国是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其具体国情同马克思重点分析的西欧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我国曾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不仅传统社会秩序根深蒂固，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别，近代以来更是在内外部冲击和压力之下积贫积弱、历经磨难。对此，列宁（1919）曾特别提醒说：“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sup>⑦</sup>这意味着，不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共同富裕，都必须经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尽管我国拥有数千年不曾中断的灿烂文明，经济总量亦曾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但人均资源条件却始终同西方社会存在较大差距，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华文明始终比西方文明更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互动，同时亦拥有更为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事实上，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我国在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2页。

④ 黄群慧、刘学良：《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关键节点的判断和认识》，《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2期。

⑤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

⑥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页。

⑦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页。



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开辟了一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内在互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sup>①</sup>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sup>②</sup>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依赖某种工业化进程，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对于落后国家如何推动工业化，李斯特（1837）曾针对德国落后国情论述到，“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不该把一个国家通过法律和制度所实现的成就纯粹归之于机遇”。<sup>③</sup>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同样需要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正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概念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sup>④</sup>当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共同富裕的阐述，更多地是针对我国落后农业国情下的广大农民如何经由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即“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sup>⑤</sup>某种程度上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内容。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其主要任务是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尽可能整合各种资源、尽快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图2清晰地表明，1956—1978年是我国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的时期，尽管期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存在较大波动，但基本维持了持续的上升趋势。我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迅速由一个拥有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落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国家，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我国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也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物质技术条件，但它本身并没能实现共同富裕，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我国是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在冷战格局的国际环境下推进工业化的。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把相对有限的农业剩余和各类资源集中于工业化建设，居民消费和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较为困顿的生活状态。第二，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多地借鉴了苏联经验或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而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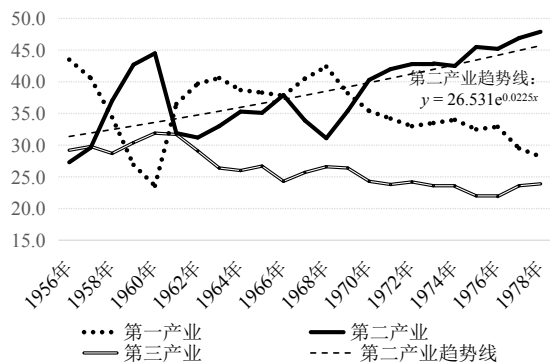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产业结构（占GDP比重）：1956—1978年（单位：%）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五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第177页。

①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

③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1页。

④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7页。

⑤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9页。

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僵化特征。第二产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以第一、三产业的不充分发展为代价的，而后者同人们的生活状况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也不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条式理解，特别是脱离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孤立、僵化地看待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并急于向所有制的“高级形式”过渡，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历经多次严重曲折并对人们的生活水平造成了较大影响。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依据该理论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①</sup>以此为基础，我们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并符合我国具体实际的共同富裕理论，并使之成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内容，其理论逻辑可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根本目的；二是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sup>②</sup>三是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着我国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们“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sup>③</sup>“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sup>④</sup>也即，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水平而对生产关系进行的适应性调整，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我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根本目的则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sup>⑤</sup>同时也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sup>⑥</sup>其基本依据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并引起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战略安排并初步勾勒了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为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围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第21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页。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国家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全面勾勒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并明确把“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设定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sup>①</sup>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sup>②</sup>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都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长期过程。在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并结合新时代以来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系统阐述了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以及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等等，并要求“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其路线图或“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sup>③</sup>

简言之，正如前文分析表明的，尽管与共同富裕有关的思想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不论是数十万年的采猎时期、万年左右的农耕时期，还是近代西欧约略300年的商业革命时期，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共同富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它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加剧了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并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马克思在批判性考察西方现代化路径及其理论回应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开辟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同时也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内在互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并符合我国国情的共同富裕理论并赋予了共同富裕新的时代内涵，而且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同时也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以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责任编辑：张超

①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②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③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